

从曲什曼墓地出土的红玛瑙珠看 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的东西方文化交流^[1]

朱乃诚

以帕米尔高原为地理坐标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发生很早。许多研究者以不同的方式，并通过古代的实物证据在不断地揭示这种文化交流现象，但是一直缺少帕米尔高原本地区发现的具有东西方共同特征的文化遗存。2013年，我国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县曲什曼墓地发掘所获得的大批文化遗存等现象，则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2]。红玛瑙珠就是其中的一例。

红玛瑙珠在帕米尔高原以东的黄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有着较多的出土，在帕米尔高原以南、以西的印度河谷、西亚两河流域地区也有较多的发现，而且后者的年代较早，早至公元前3000年。所以，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黄河流域的早期红玛瑙珠是从西亚引进的^[3]。但是不能确指具体的引进途径。

帕米尔高原横亘于中亚的腹地，我国古代称之为葱岭，正好是连接东西方的中间孔道。曲什曼墓地发掘出土的红玛瑙珠证实了东西方之间的红玛瑙珠的传播途径是通过帕米尔高原实现的。

然而，在古代东西方分别发现的红玛瑙珠有相同的形制，也有不同的形制，情况比较复杂。这些复杂的现象应是蕴含着较为深层的历史文化现象，对此自然不能使用简单的方式去解释。下面笔者以近年来在曲什曼墓地发现的红玛瑙珠为契机，分析在东西方发现的红玛瑙珠所显示的复杂现象，进一步探讨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问题。

一、曲什曼墓地出土的红玛瑙珠的情况

位于帕米尔高原东部的曲什曼墓地出土的红玛瑙珠，主要有管状珠、圆饼形珠，以及各种蚀花玛瑙珠，数量不多，但很有特色。

红玛瑙管状珠1枚，形制为不规则圆柱体，上下两端略收，中腹凸鼓，并形成凸棱，中间穿一孔（图1）。这种管状珠，器身较长，是两边穿孔。中腹凸鼓呈凸棱，类似竹节凸棱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圆形扁平珠 17 枚，形制为扁平的圆饼状，在侧棱上穿孔。由于这类圆饼形珠较薄，所以在圆饼形珠的侧棱（边）上穿的孔都很细小（图 2）。另有 1 枚方形扁平珠，也是在侧棱（边）上穿孔（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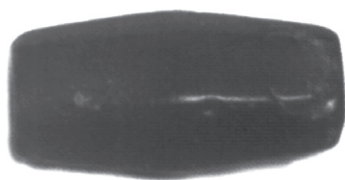


图 1 曲什曼 A 区 M2 出土红玛瑙管状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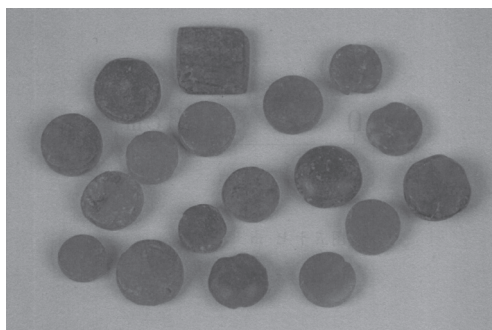


图 2 曲什曼 B 区 M11 出土圆形与方形扁平珠

蚀花红玛瑙珠有 5 枚，为圆饼形、方饼形、长方饼形、管状腰鼓形等几种（图 3）。蚀花的纹饰有圆圈纹、“亚”字形纹、直线纹、W 形纹、平行直线纹，以及在圆饼形珠边上以短直线组成呈放射形的圆圈纹。还有 1 枚两端呈黑色、中段呈白色的黑白两色腰鼓形管状玛瑙珠，虽然不是红玛瑙（见图 3）。但也是一件蚀花玛瑙管状珠。

圆球形红玛瑙珠 1 枚，中间穿一孔（图 4）。

以上这些制品在曲什曼墓地墓葬中的出土情况大致如下。

1 枚圆球形珠出自 A 区中心墓葬 M1 中的头骨旁，同出的还有 3 枚圆形料珠。这 4



图 3 曲什曼 B 区 M11 出土蚀花玛瑙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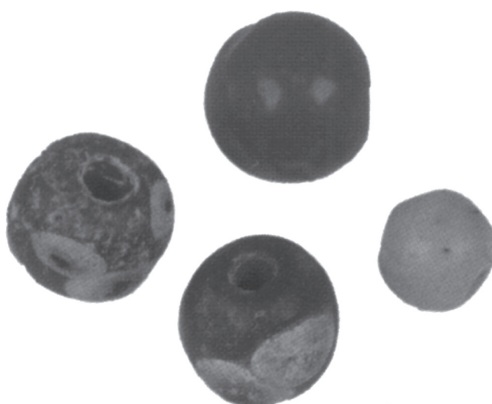


图 4 曲什曼 A 区 M1 出土圆球形珠
（中间上面 1 枚为红玛瑙珠）

枚圆形珠犹似蜻蜓眼状。该墓出土的还有木梳（篦）等。

1枚管状红玛瑙珠出自A区M2墓葬中。该墓出土物还有毛毡残片、铜扣、木梳（篦）、兽骨、料珠、石眉笔、六棱形琉璃珠等。

圆饼形、方形扁平红玛瑙珠与蚀花玛瑙珠都出自B区M11墓葬中。B区M11墓中葬有3具人骨架，都为女性，随葬品较为丰富。并且分别有一串珠。其中1号骨架为一串料珠。2号骨架为一串圆饼形、方形扁平红玛瑙珠。3号骨架为一串蚀花玛瑙珠。在3号骨架左手腕处还有一组铜串饰和石画眉棒，在右手臂上套铜镯，右手臂下有铜镜。随葬品中还有陶器、木器等。其中在1号骨架脚端有一件烧残的圣火坛。

以上这些是曲什曼墓地2013年发掘发现的红玛瑙珠的基本情况。2014年在曼什曲墓地的发掘中又发现了一些红玛瑙制品。关于曲什曼墓地的年代，发掘主持者依据14C测年数据，推定在距今2500年左右。

就目前的发现看，这些红玛瑙制品的出土情况在A区墓地与B区墓地的组合情况有所区别，表明他们之间或许存在着年代区别。其中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珠出自A区M2，年代可能略早。圆饼形、方形扁平红玛瑙珠与蚀花玛瑙珠出自B区M11，年代可能略晚。由此推测曲什曼墓地A区可能早于曲什曼墓地B区。

此外，1979年发掘的塔什库尔干县香宝宝墓地也发现3枚玛瑙珠，分别出自3座墓中，都为腰鼓形管状珠。其中2枚为红玛瑙制品，M5：5为较短的腰鼓形管状珠，最大直径1厘米，高1.5厘米（图5）；M37：5为较长的腰鼓形管状珠，最大直径1.5厘米，高3.8厘米（图6）。1枚M10：9为细长的腰鼓形管状玛瑙珠，呈黑白两色，可能也是蚀花玛瑙珠，最大直径0.8厘米，高2.6厘米（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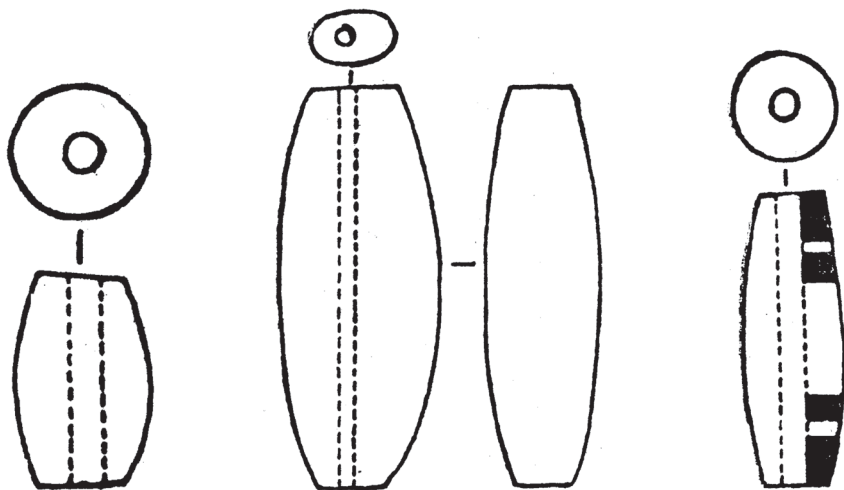


图5 香宝宝 M5：5 红玛瑙珠 图6 香宝宝 M37：5 红玛瑙珠 图7 香宝宝 M10：9 蚀花玛瑙珠

香宝宝墓地有3个¹⁴C测年数据，分别为2505“年”±80“年”（M13）“年”2650“年”±120“年”（M17）；2850“年”±105“年”（M21）^[4]。据此推测香宝宝墓地的年代在春秋时期，可能与曲什曼墓地相当或略早一些。

二、蚀花红玛瑙珠的东传及其年代

2013年发掘曲什曼墓地发现的蚀花红玛瑙珠有5枚（见图3）。

蚀花红玛瑙珠又称蚀花肉红石髓珠。制作蚀花红玛瑙珠是在制成红玛瑙珠之后实施的一种特殊工艺，即使用一种特殊的浆液侵蚀红玛瑙珠表面并经烘干形成白色花纹^[5]。现在看来制作蚀花红玛瑙珠很简单，但在古代却是一种专门的技术，只有掌握了这门技术工艺的人才能制作。所以蚀花红玛瑙珠的起源是在一个地方发生的，并且是该地区的一种文化传统。

我国在20世纪初开始发现蚀花红玛瑙珠，但数量比较少。

1904年和1913年，斯坦因在新疆和阗发现5枚蚀花红玛瑙珠（图8-1~5）^[6]，1928年黄文弼在新疆沙雅县西北裕勒都司巴克发现1枚蚀花红玛瑙珠（图8-6）^[7]，1956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时期墓葬中出土1枚蚀花红玛瑙珠（图9）^[8]。对于这些发现，因不解红玛瑙珠上的花纹是如何形成的，或没有公布彩色图片，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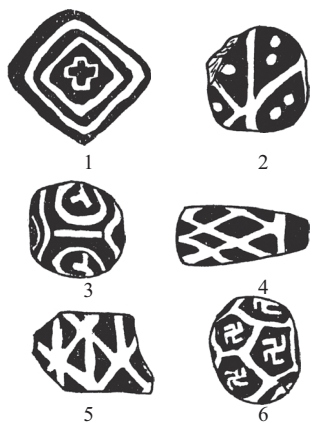


图8 和阗5枚（1~5）沙雅1枚（6）蚀花红玛瑙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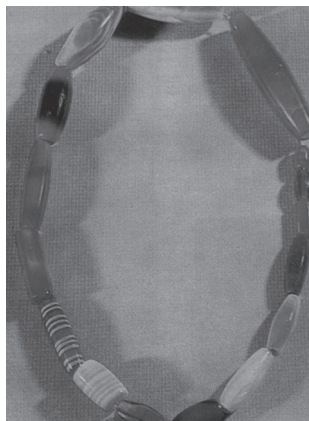


图9 石寨山M13玛瑙串珠

1972年，曾广泛收集研究了古代埃及串珠的夏鼐^[9]，在观察石寨山墓地出土的蚀花红玛瑙珠后引起了注意，撰文介绍我国发现的蚀花红玛瑙珠以及印度河流域至埃及发现的蚀花红玛瑙珠的情况，并指出新疆出土的几枚蚀花红玛瑙珠可能是与犍陀罗佛教艺术一起传入的。而云南石寨山1枚蚀花红玛瑙珠是否为本地所制造，抑或系输入品，殊难断言，还有待于更多的材料出土^[10]。

后来在新疆若羌县楼兰古城^[11]、和静县察吾呼沟口三号墓地M18^[12]与四号墓地M4^[13]、吉木萨尔县大龙口墓地M5^[14]、温宿县包孜东墓地85WBBM41^[15]、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M13^[16]、民丰县尼雅遗址^[17]、于田县克力雅河下游的圆沙古城^[18]、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乙M8^[19]、陕西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20]、咸阳市马泉西

汉墓^[21]、河南淅川县下寺 M2^[22]、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墓地^[23]、曲靖市八塔台墓地^[24]、广州汉墓^[25]等地的遗址或墓葬中分别出土了蚀花红玛瑙珠^[26]。

以上这些是我国已发现的蚀花红玛瑙珠的大致情况。其中以新疆的发现为主。而年代比较早的，除本文介绍的位于帕米尔高原的曲什曼墓地出土的蚀花红玛瑙珠外，主要是新疆和静县察吾呼沟口四号墓地 M4、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 M13、陕西宝鸡益门村二号春秋墓、河南淅川县下寺 M2 出土的蚀花红玛瑙珠。后两者的年代在春秋晚期，而前两者的年代可能早至西周时期。

察吾呼沟口四号墓地 M4、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 M13、淅川县下寺 M2 出土的蚀花红玛瑙珠都是在圆柱形管状或腰鼓形管状红玛瑙珠外表蚀横向的若干条白色线条，蚀花红玛瑙珠的形制与蚀花纹饰与曲什曼墓地出土的腰鼓形管状蚀花红玛瑙珠的相同。而 1992 年在陕西宝鸡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出土的 1 枚蚀花红玛瑙珠（图 10）^[27]，形制为圆形、平底，顶呈圆锥形，自顶点有白色射线 4 条，似成“十”字纹，中各夹一小白色圆点。这种红玛瑙珠的形制与蚀花纹饰目前在曲什曼墓地还没有见到。



图 10 益门村二号春秋墓串珠（1 枚为蚀花红玛瑙珠）

蚀花红玛瑙珠在印度河流域及西亚发现很多，而且年代很早。夏鼐在 1974 年的文章中还介绍了英国学者培克（H. C. Beck）于 1933 年研究印度河流域及西亚蚀花红玛瑙珠的成果。

培克将印度河流域及西亚的蚀花红玛瑙珠划分为公元前 2000 年以前的早期、公元前 300~200 年的中期和公元 600~1000 年的晚期（图 1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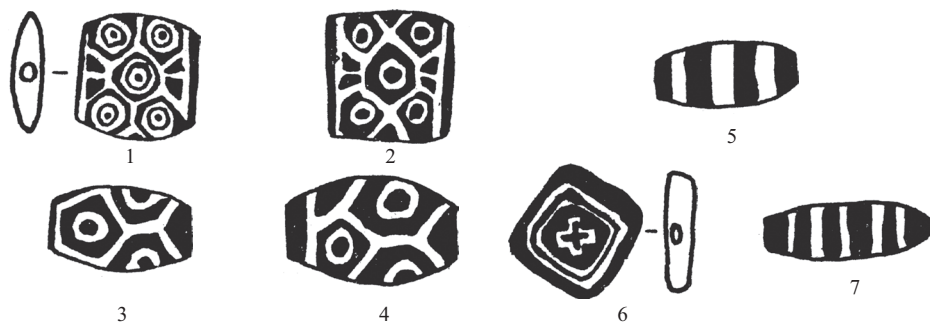


图 11

1. 巴基斯坦摩亨佐·达罗出土 2、4. 伊拉克乌尔出土 3. 埃及阿拜多斯出土 5. 伊拉克刻什出土（以上属早期）
6、7. 且叉始罗出土（中期）

曲什曼墓地发现的蚀花红玛瑙珠，大约相当于培克划分的中期。因为出土蚀花红玛瑙珠的 B 区 M11（3 具骨架）附近的 M14 出有料珠，料珠上有“十”字纹（图 12），是培克所划分的中期蚀花红玛瑙珠上的典型纹饰。另外，B 区 M11 墓中出土的圆形扁平红玛瑙珠（见 2）与印度孔雀王朝时期的圆形扁平红玛瑙珠相同。



图 12 曲什曼 B 区 M14 出土料珠

这些都说明曲什曼墓地 B 区 M11 的这些红玛瑙珠及其墓葬的年代可能相当于培克划分的中期。而曲什曼墓地年代的上限可能在距今 2500 年前。所以，依据曲什曼墓地的发现，还可以将培克划分的蚀花红玛瑙珠发展阶段的中期的开始年代，提前至公元前 500 年之前。

曲什曼墓地发现的蚀花红玛瑙珠，为进一步说明我国新疆、陕西等地发现的这类蚀花红玛瑙珠是经过帕米尔高原由印度河流域传入的，提供了重要证据。

就目前我国已发现的四五十枚蚀花红玛瑙珠的现象分析，曲什曼墓地 B 区 M11 墓中出土的 5 枚蚀花红玛瑙珠的年代是较早的，浙川县下寺 M2 出土的蚀花红玛瑙珠的年代可能与曲什曼墓地出土的同时。但曲什曼墓地位于帕米尔高原的交通孔道，浙川县下寺的蚀花红玛瑙珠，可能是经由曲什曼墓地所在的帕米尔高原转折传播过去的。

新疆其他地区以及黄河流域的早期蚀花红玛瑙管形珠也可能是经由曲什曼墓地所在的帕米尔高原转折传播过去的。

陕西宝鸡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出土的 1 枚蚀花红玛瑙珠（见图 10）。虽然在曲什曼墓地还没有发现与之形制与纹饰相同的蚀花红玛瑙珠，但其与斯坦因在新疆和阗发现的 5 枚蚀花红玛瑙珠中的 1 枚相同（见图 8）。这表明陕西宝鸡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出土的蚀花红玛瑙珠，也可能是经由曲什曼墓地所在的帕米尔高原引进印度河流域的蚀花红玛瑙珠而传播过去的。

蚀花红玛瑙珠传入我国的年代，如果依据目前在曲什曼墓地的发现为依据，可以推定在公元前 500 年前后。但黄河流域的陕西宝鸡益门村二号墓属春秋晚期早段，也在公元前 500 年前后。两者的年代大体相同。或许曲什曼墓地所在的帕米尔高原一带还会有年代更早的蚀花红玛瑙珠，因为只有这里先使用了蚀花红玛瑙珠，然后才有可能传到黄河流域。

新疆和静县察吾呼沟口四号墓地 M4、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 M13 出土的蚀花红玛瑙珠的年代可能在西周早中期，从而早于曲什曼墓地出土的蚀花红玛瑙珠的年代。这

同样表明在曲什曼墓地所在的帕米尔高原一带还会有年代更早的蚀花红玛瑙珠的发现。

需要注意的是，黄河流域发现的经帕米尔高原引进的红玛瑙管形珠的最早年代在公元前 1200 多年前的商代晚期。西周时期的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已显示出接受印度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见下述），然而却没有一例蚀花红玛瑙珠，即使在春秋及其以后的中原地区发现的这类蚀花红玛瑙珠也十分少见。这或许表明中原地区的居民（主要指贵族）不喜爱白色纹饰蚀花红玛瑙珠奇异风格，所以西周贵族在引进红玛瑙管形珠装扮自身时，却排斥蚀花红玛瑙珠的装饰风格。

三、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所反映的帕米尔高原 与中原地区及印度河流域的文化联系

2013 年曲什曼墓地出土的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只有 1 枚（见图 1）。但形制特征鲜明。这种特征鲜明的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在黄河流域的西周至春秋时期贵族墓中有较多的出土。对此，黄翠梅曾做过系统的收集与专门的研究^[29]。

如 1974~1981 年发掘的宝鸡竹园沟一号墓、四号墓、七号墓、九号墓、十三号墓，茹家庄一号墓、二号墓，2003 年发掘的纸坊头二号墓等都出土了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其中 2003 纸坊头二号墓出土的两枚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长 2 厘米，外径 0.8 厘米，内径约 0.5 厘米（图 13）^[30]，该墓的年代可能属西周初年。

1977~1982 年期间发掘的陕西扶风北吕西周墓地中，北吕 VM34、北吕 VM148、北吕 VM2083 三座墓中出土了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其中北吕 VM34 墓属北吕墓地第二期^[31]，大约在商代末期的帝乙帝辛前期，即文王“作邑于丰”之前。这大概是目前在我国发现的年代较早的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珠。

1983~1986 年发掘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墓地，在 M61^[32]、M320^[33] 墓中出土了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1986 年发掘甘肃崇信于家湾墓地，在揭露的 M130 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 3 组串饰，其中有 1 枚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34]。

其他如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墓地^[35]，山西曲沃晋国墓地^[36]、北赵晋侯墓地^[37]、羊舌晋侯墓地^[38]、绛县横水倮伯墓地^[39]、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40]，陕西扶风刘家东壕西周丰姬墓^[41]、扶风黄堆乡强家 M1^[42]、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43]，山东济阳刘台子逢国夫人墓^[44]，河南平顶山北澧村应国墓地^[45]等都出土了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亦出有红玛瑙管珠。如三星堆 K2 ②：88 铜罍中有 5 组串饰，其中一组串饰（K2 ②：88-008）由 2 枚红玛瑙珠、2 枚红玛瑙管组成。2 枚红玛瑙管呈腰鼓形，其中一枚中部似起棱^[46]。这可能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另两枚红玛瑙珠的形制与妇好墓出土的红玛瑙珠的形制相同。表明这些红玛瑙制品可能是由中原地区传过去的。

而至春秋中晚期这种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在中原地区的使用逐渐淡出。但在云南晋宁李家山（图 14）、广西合浦汉墓中^[47]还偶尔能见到。这些后期的竹节凸棱状红

玛瑙管形珠可能是黄河流域早期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在边地区的沿用，也不排除是后期从域外引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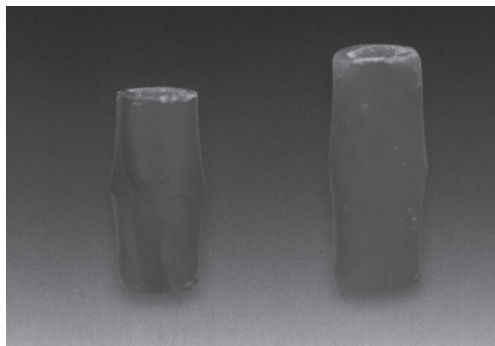


图 13 纸坊头 2003BZFM2 : 9 红玛瑙管形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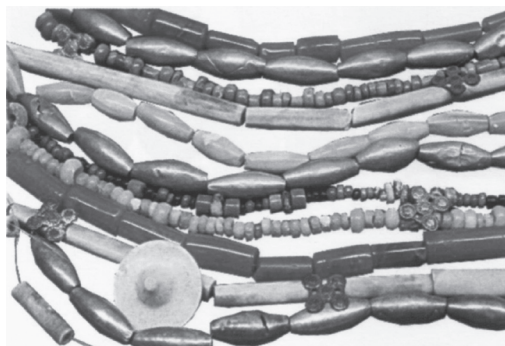


图 14 晋宁李家山墓葬中出土的珠襦局部

以上介绍的以往的这些发现表明，黄河流域及周边地区在商代末期至春秋早中期在贵族使用的串饰中流行搭配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现在帕米尔高原也发现了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表明黄河流域使用的这类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应与帕米尔高原有联系。

曲什曼墓地出土的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与帕米尔高原以南的印度河流域、以西的西亚两河流域也有联系。国际学术界早已注意到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发现的年代很早的红玛瑙制品。如在两河流域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乌尔的王室墓葬中出土的公元前 2700 年的由黄金珠、红玛瑙珠管、青金石珠管等组成的串饰中就有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图 15~图 17）^[48]。在印度河谷的摩亨佐·达罗出土的约公元前 3000 年的红玛瑙管串饰，红玛瑙管的长度达 10 厘米以上（图 18）^[49]。印度河流域及两河流域使用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珠管的历史比黄河流域的早 1500 多年。

黄河流域、帕米尔高原、印度河流域及两河流域的这些发现说明，这种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可能是由西亚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经过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原地区的。而西亚两河流域使用的红玛瑙珠管是由印度河流域传播过去的。所以传入中国境内的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实际上是从与帕米尔高原毗邻的印度河流域引进的。

依据黄河流域的发现，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传入中原地区的最早时间可能在商代末期及先周晚期，而这种制品的较大量的输入或仿制则可能是从西周初期开始的，并且以其艳丽的色彩，逐步成为中原地区贵族装扮的嗜好。

由此推测在帕米尔高原一带可能存在着中原地区西周王朝之前即公元前 1100 多年前的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等遗存，有待发现。

笔者还推测中原地区与帕米尔高原一带的文化联系与交流可能早在公元前 1200 年以前的商代晚期就已经发生。殷墟妇好墓出土的 1 枚腰鼓形红玛瑙管形珠^[50]，可能就是通过帕米尔高原由印度河流域引进的。然而，中原地区与帕米尔高原一带发生的文化交流的内容，不仅是传输红玛瑙管珠，而且可能主要是玉料，即产自帕米尔高原东部一

带的和田玉。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有一部分的玉料可能具有和田玉的仔料。



图 15 乌尔王室墓红玛瑙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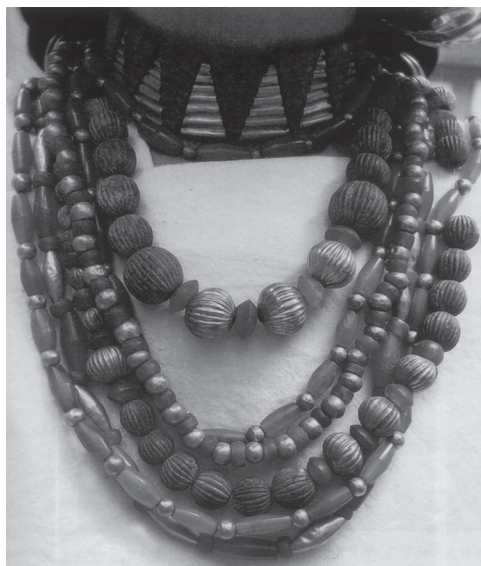


图 16 乌尔王室墓串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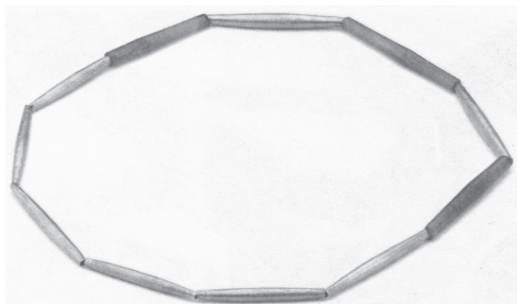


图 17 乌尔王室墓串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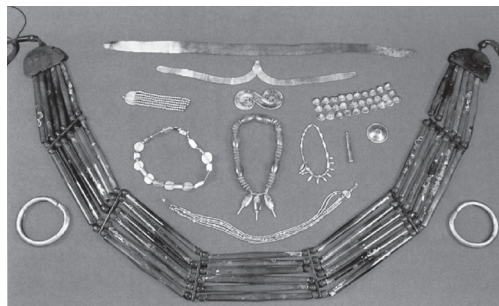


图 18 摩亨佐·达罗出土的红玛瑙管串饰与黄金制品

黄河流域与帕米尔高原的文化交流可能是直接的，其文化交流的最初契机和主要内容是采集和田玉料。在和田流水墓地发现的距今 3000 年左右的玉管（图 19）^[51]，恰好说明黄河流域与帕米尔高原一带存在着的玉文化方面的联系。

流水墓地发现的这种玉管不见于西亚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化遗存中，而在黄河流域及周边地区则有年代更早的发现。如公元前 3000 年前的红山文化玉管珠，公元前 3300 年前的崧泽文化玉管珠、玛瑙管珠，以及公元前 5300 年以前的兴隆洼文化的玉管。

尽管印度河流域与帕米尔高原一带的和田玉玉料产地相距很近，然而在印度河流域及西亚两河流域的早期饰品中，虽然红玛瑙管珠制品、黄金制品相当发达，但是却很少见到玉制品。这说明中国早期的玉文化与印度河流域及西亚两河流域没有产生直接的交

往。这一特殊现象也表明，黄河流域与西亚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文化交流或传播是间接的，是通过帕米尔高原这一地理通道发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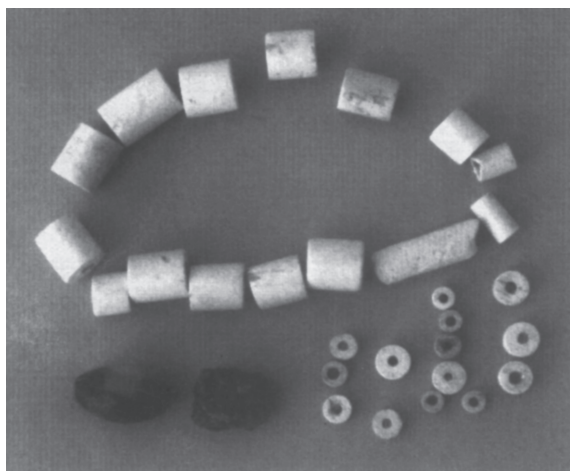


图 19 流水 M28 : 4 玉管串饰

印度河流域的红玛瑙管形珠可能是在黄河流域与帕米尔高原东侧一带的文化交往中，尤其是在玉文化交往中，顺便引入到中原地区的。也就是说，红玛瑙管形珠先由印度河流域传入帕米尔高原一带，然后再将这种制品或使用这种制品的方式从帕米尔高原东侧区域引进中原地区。所以在中原地区发现的高代晚期和田玉制品较多，而红玛瑙管形珠却少见。

四、结 语

以上笔者通过对曲什曼墓地发现的红玛瑙珠的分析而引发的思考所形成的认识，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蚀花红玛瑙珠大致是在西周早期经过帕米尔高原传入我国，并在春秋时期传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蚀花红玛瑙珠，是在红玛瑙珠上实施一种特殊的工艺制作纹饰而形成的。这种工艺发生于印度河流域，不为中原地区所掌握。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蚀花红玛瑙珠都是经过帕米尔高原的通道由印度河流域传入的。目前在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蚀花红玛瑙珠是陕西宝鸡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和浙川县下寺 M2 出土的蚀花红玛瑙珠。这种蚀花红玛瑙珠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没有流行起来。大概是当时的贵族不喜爱使用蚀花这类的纹饰来装扮自身。然而，以往不知这种蚀花红玛瑙珠是通过哪条途径传入黄河流域的。曲什曼墓地发现的蚀花红玛瑙珠证实了在黄河流域及周边地区发现的蚀花红玛瑙珠是在春秋时期通过帕米尔高原传入的。而新疆和静县察吾呼沟口四号墓地 M4、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 M13 出土的年代可能在西周早中期的蚀花红玛瑙珠则表明，通过

帕米尔高原传入我国的蚀花红玛瑙珠可能在西周早期就已经发生，在曲什曼墓地所在的帕米尔高原一带还会有年代更早的蚀花红玛瑙珠。

第二，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可能是在公元前 1100 年以前由印度河流域传入的，帕米尔高原是汉代丝绸之路之前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通常认为迟至商代晚期，中原地区接受了西亚高加索地区的文化影响，如马车、铜镜、铜刀等。但是，长期以来并不知道这种文化影响交流是通过什么路径实现的。

位于帕米尔高原东部的曲什曼遗址的发现，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汉代丝绸之路之前黄河流域与西亚的文化交流，其中的一条路线可能是通过帕米尔高原的孔道进行的。最先发生的大概是紧邻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与印度河流域，然后逐渐分别东向黄河流域、西向西亚推进。主要证据就是以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根据黄河流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推测，黄河流域经由帕米尔高原引进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的初始年代，大概在商代末期西周初期。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中期，这种文化引进达到了高峰。

黄河流域与帕米尔高原一带的文化交往的最初导因，可能并不是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而是盛产于帕米尔高原东侧区域的和田玉。和田玉玉料得到具有玉文化传统的商代贵族的喜爱，商王武丁配偶之一妇好墓中出土的一批精致玉器的玉料，有的可能是和田玉仔料。和田玉玉料东传的最初时间可能在商代晚期之前就已发生，商代晚期只是延续了和田玉玉料东传的线路，到达了商代王畿。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可能是在黄河流域与帕米尔高原东侧区域发生的玉文化交往中被注意到并引入中原地区。所以在商末周初，中原地区发现的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的数量很少。

相比于东亚古老的玉文化传统，西亚以及印度河流域的玉文化却逊色许多。那里缺乏早期的玉制品。黄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乃至西亚不可能发生直接的玉文化交流。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的文化交流是通过帕米尔高原的中转而间接发生的。先有帕米尔高原一带分别与印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的直接的文化交流，后有黄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中间通过帕米尔高原的间接的文化交流。

由此表明帕米尔高原一带在汉代丝绸之路之前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根据以上的认识，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在帕米尔高原东侧区域应有公元前 1100 年以前的具有印度河流域红玛瑙珠制品特色的文化遗存，包括蚀花红玛瑙珠和竹节凸棱状红玛瑙管形珠。我们期待着新的发现。

至于在商代之前即公元前 1600 年以前，黄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乃至西亚地区是否已经发生了文化交流，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注 释

- [1] 红玛瑙又称肉红石髓，见作铭：《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注③，《考古》1974年第6期。红玛瑙珠即为肉红石髓珠，为求通俗，本文使用红玛瑙珠一名。本文所引用的曲什曼墓地的发掘资料，主要限于2013年的发掘收获，是由曲什曼墓地发掘主持者巫新华研究员提供的。专此

致谢。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巫新华:《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情况介绍》,《曲曼遗址与帕米尔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2014年7月28日。
- [3] [英]杰西卡·罗森:《红玛瑙珠、动物塑像和带有异域风格的器物——公元前1000~前650年前后周及其封国与亚洲内陆的交流迹象》,《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黄翠梅:《文化·记忆·传记—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的玉璜及串饰》,《东亚考古的新发现(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中研院,2013年。
- [4]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 [5] 据夏鼐引英国人麦凯(E.Mackay)在20世纪30年代调查今巴基斯坦信德省萨温城(Sehwan in Sindh)的一个老工人的制作所记。将当地一种野生的白花菜(*Capparis aphylla*)的嫩茎捣成糨糊状,和以少量的洗涤剂(碳酸钠)溶液,调成半流体状的浆液,用麻布滤过即成(颜料)。然而取一已磨制光亮的红玛瑙珠,将它固定于黏土上。干燥后,用笔将颜料绘画花纹于珠上。熏干后,将它埋在木炭余烬中,用扇子徐煽灰烬以加热,约5分钟后取出。红玛瑙珠从土块中取出后,候之冷却,最后用粗布加以疾擦,即得光亮的蚀花红玛瑙珠(见本文注[1]作铭文)
- [6] 斯坦因:《塞林第安》(A.Stein, Serindia)第1卷,100、117、122、127页,第4卷,图版IV,1921年;斯坦因:《亚洲腹地》, (A.Stein, Innermost Aria),第侨眷,110页;第4卷,图版X,1928年版。转引自作铭:《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考古》1974年第6期。
- [7]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19~120页,图版壹壹贰.75,科学出版社,1958年。转引自本文注[1]作铭文。《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考古》1974年第6期。
- [8] 同[1]作铭文。
- [9] 夏鼐在1943年完成了《古代埃及串珠》的博士论文。201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见 Nai Xia. Ancient Egyptian Beads.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an) and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4。
- [10] 同[1]作铭文。
- [11] 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 [1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新疆察吾呼》图一〇一:21、图版四一:6、图版七三:2,东方出版社,1999年。
- [13]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察吾呼沟口四号墓地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87年第1期。
- [1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木萨尔县大龙口古墓葬》,《考古》1997年第9期。
- [1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宿县包孜东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86年第2期。
- [1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
- [17] 新疆文物局、上海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第216页图121,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 [18] 温宿县包孜东墓地与圆沙古城遗址出土的蚀花红玛瑙珠见于新疆博物馆的常设展览。
- [19]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第161页,图版七八:4,文物出版社,1993年。
- [20]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10期。
- [21] 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考古》1979年第2期。

- [2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第201页,图版七二:1,文物出版社,1991年。
- [23]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图一三六:7、8,彩版一七六:5、6,文物出版社,2007年。
- [2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第119页,图一〇二:7、8,科学出版社,2003年。
- [25] 广州市文物光里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编:《广州汉墓》,第291页,图版四:1、九〇:3,文物出版社,1981年。
- [26] 赵德云收集了这些发现并进行了型式分析等研究。见赵德云:《中国出土德蚀花肉红石髓珠研究》,《考古》2011年第10期。
- [27] 朱晓丽:《中国古代珠子》书末彩色插图,广西美术出版社,2010年。
- [28] 转引自本文注[1]作铭文。
- [29] 同[3]黄翠梅文。
- [30]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陕西宝鸡纸坊头西周早期墓葬清理简报》,第31页,图一三,《文物》2007年第8期。
- [31] 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罗西章:《北吕周人墓地》,图版五九:3,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
-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玉器》,彩版353,文物出版社,2007年。
- [33] 同[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第262、263页,中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 [3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崇信于家湾周墓》,彩版一一:4,文物出版社,2009年。
- [35] 北京市文物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第34~36、236~239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北京天津河北》,图6,科学出版社,2005年。
- [36]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天马一曲村(1980~1989)》第2册,第395~404、411~429、478~482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 [37]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上海博物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
- [3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沃县文物局:《山西曲沃羊舌晋侯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期。
- [3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
- [40] 谢尧亭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2010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1年;谢尧亭:《发现霸国——讲述大河口墓地考古发掘的故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 [41] 周原博物馆编:《周原玉器萃编》,第8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 [42] 周原扶风文管所:《陕西扶风强家一号西周墓》,《文博》1987年第4期;图4;同[41]

- 第 86 页。
- [4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景区管理委员会编著：《梁带村芮国墓地——2007 年度发掘报告》，M17:23，图版一六一：6，M51:14，图版一八五：2，文物出版社，2010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 M27 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6 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 M26 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1 期；蔡玫芬、蔡庄良主编：《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M19、M 26、M 27，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 年。
- [4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文物》1996 年第 12 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济阳刘台子玉器研究》，台北众志美术出版社，2010 年。
- [4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平顶山应国墓地》卷 I，彩版 14，大象出版社，2012 年。
- [4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 405 页，图版 161-2，文物出版社，1999 年。
- [47] 同 [27]。
- [48] 同 [3] 杰西卡·罗森文第 410 页；同 [27]，308 页。
- [49] 大英博物馆藏品，见 [1] 杰西卡·罗森文第 410 页。
-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彩版三六：2，文物出版社，1980 年。
- [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于田县流水青铜时代墓地》，《考古》2006 年第 7 期。